

从为官之本到居家之训

——张岳崧的《家训十则》

□ 张 燕 宁 波

张岳崧（1773—1842年），字子俊，琼州府定安县高林里（今海南省定安县永丰乡高林村）人。幼时聪慧好读书，七八岁时，与孩童游约，书不释手，常常“旁及史传诸书”“述古人事娓娓动听”。嘉庆九年（1804年）31岁的张岳崧广东乡试中举，5年后殿试一甲探花及第，传胪唱名时，嘉庆皇帝特谕“何地无才”。

张岳崧是海南科举史上的唯一一探花郎，为官数十载，政绩平实通达；选贤任能、赈济救灾、治理水患、修史撰志，晚年显绩为协助林则徐在雷州、琼州禁烟。然而，家境的贫寒致使张岳崧18岁时便开始设帐授徒，赴京会试时坐馆自给生活，41岁丁忧居家及候阙复官时先后讲席于广东琼台、肇庆、粤秀三大官立书院，50岁任翰林院编修，教习庶吉士。可以说“为官”与“育人”贯穿张岳崧的一生，劝士勉学和育人荐贤也是张岳崧最重要的实绩与贡献。

嘉庆十八年（1813年），张岳崧在服丧守制时受族人所托，重修族谱，守丧期满后回京候选，为族谱题序时撰写了《家训十则》，其要义为：“略举十事，原本五常，既用自箴，亦以共勉”，十则内容分别为“官箴、民则、劝孝、劝慈、劝友、劝恭、夫道、妇职、择友、集益”，体现了张岳崧从为官之本到居家之训的教育理念。

《家训十则》的核心要义

正心修身、教化育人和经世报国是张岳崧撰写家训的核心要义。张岳崧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率先垂范修身正己，立志“励循良以报国恩，建勋名而光族党”，修身、耀祖和报国融合于张岳崧成长成才的历程中。在《家训十则·官箴》中，张岳崧强调：“读圣贤书，任国家事，一命亦堪济物，上官岂以底身？既教养之恩受诸朝典，况忠爱之义得自性生。”在张岳崧的认知中“读圣贤书、任国家事”是一个人的最高标准，然而“达则兼济天下”经世为官的目的，即便“一命亦堪济物”，不以官职底身，重要的是寻源教养之恩和忠爱之义，前者来自朝仪盛典，后者来自个体修为，将正心修身、教化育

人和经世报国的思想熔铸于家庭教育实践中。

受儒家思想影响，原本“五常”即以仁、义、礼、智、信作为修身齐家的行为准则。“五常”语出《尚书·泰誓下》：“狎侮五常”，孔颖达疏云：“五常即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事实上“五常”来自儒家的五伦思想，据《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王充《论衡·问孔》评议：“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也。”至董仲舒则将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作为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也是维持社会稳定和人际关系和谐的行为准则。张岳崧自幼以儒家经书启蒙，在琼山私塾时将《尚书》《易》《诗》《礼》等数部儒家经典作为研读重点，在粤秀书院读书时遍览经、史、子、集各类书籍，最终张岳崧成长为儒学名士。因此，以“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思想是张岳崧《家训十则》的指导思想，体现于“十事”教诫规劝的言辞中，目的是教化子孙明断为官大义、为民要则、治家精髓、夫妇之道、择友要义和言行规范，谆谆教诲、循循善诱引领子孙后代的绵延与成长。

把廉洁清正作为“入官之本”“臣节之基”

《家训十则·官箴》记录的是张岳崧学而优则仕的从政箴言，反映了他结束翰林院学习、告假归养父亲、丁忧守制后入仕为官的志向和誓言，直接体现了其撰写《家训十则》“既用自箴，亦以共勉”的写作意图。

具体而言，《家训十则》中《官箴》居首，目的是明君恩、析臣节，全君臣之义。张岳崧规训子孙“臣节”即为臣子的气节，表现为“六计尚廉操守，先乎臣节”。“六计”见于《周礼·天官·小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贾公彦疏：“六者不同，既以廉为本”，廉洁成为考察官员的首要标

准。廉洁操守正是张岳崧《家训十则》之《官箴》的核心要义，其言“苟簠簋弗饰”，是对为官者不廉洁的一种说法，见于《汉书·贾谊传》：“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簠簋不饰’。”为官不廉洁就如同簠簋这两种重要的祭祀器物和生活器皿不清洁、不修饰、不整齐，其危害是“既蠹国而病民”，也就是祸国殃民。因此，廉洁的操守就是张岳崧劝诫子孙的“臣节”之基。不仅如此，“清、慎、勤，入官之本；才、智、勇，应务之资”，清廉、谨慎和勤奋是为官者的核心品质，才学、智谋和担当是为政者的基本素养。

忠孝恭谨的“居家之训”

张岳崧《家训十则》除官箴条目之外，民则、劝孝、劝慈、劝友、劝恭、夫道、妇职、择友、集益等九项内容，均是千百年来家训的常见内容，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对家族成员行为的规范和劝诫，可以被视为“居家之训”，旨在培育“家修克谨，即循礼奉法之民”。

具体而言，“居家之训”中《民则》居首，是教育子孙忠于国家的行为准则，强调为民者要珍享盛世福利，要“守礼正俗，即以恪奉王章”，要“戒讼息争，无非敬尊宪典”，将国家法规作为家庭教育重点，将循礼奉法作为规范行为的关键。

《劝孝》《劝慈》《劝友》《劝恭》《夫道》《妇职》昭示千年来家庭教育的精髓，规劝的是家庭成員日常生活中应当具有的行为规范。《劝孝》《劝慈》强调孝亲的重要性，前者强调“天地之性人为贵，伦常之本孝为先”，为人子者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孝亲；后者强调育儿成才要以敬爱父母为前提，养成勤俭节约、言行笃实的优良品质，最终因美质而成大器。《劝友》《劝恭》强调长幼尊卑之间的恭敬谦逊，前者强调：“手足之爱，兄弟是依”，兄友弟恭，休戚与共；后者讲求“不藏怒，不宿怨”，长幼之间恭敬谦逊、互敬互爱，才是“涕泣而道”，也就是最动人的情感，有助于“和气聚于门庭”，并将此“风化推之宗族”。《夫道》《妇职》强调“先明倡化之原，始尽齐家之道”，夫妇

相敬、仁爱守礼是家庭兴盛的源头，也是齐家之道的根本。在阐释夫妇关系及各自对家庭的贡献和子女教育的责任时，张岳崧指出“严乎男女，伦纪重乎夫妻”，家庭中夫妇男女各守本分是夫妻关系最重要的法则；“以正为义者，夫之纲；以顺事人者，妇之职”，受儒家纲常伦理思想的影响，对于夫妻之道的论述存在迂阔之嫌，但夫正妻贤却成为家风建设绵延流长的精髓；夫妻合力“慎此观型，庶彰风范”，谨慎地遵循夫妻处事法则，就会逐渐形成良好家风。

如果说上述“居家之训”是围绕个人成长和家庭育人的层面展开的谆谆教导，那么《择友》《集益》篇章在将个人成长置于社会关系中，突出强调的是为人处事的良好品质和原则。张岳崧强调“同道为朋，同志曰友”，交友要“先明慎交之义，更陈集益之方”，要知道“君子之交如水”“同心之言如兰”，将仁、义、礼、智、信作为交友的准则，才能获交正直、忠厚、博学的朋友。无论是仕者、学者、曲艺之人还是耕种农人，无不需要知交良友，真正的朋友“善劝过规，其大者在伦纪纲常之要；观摩砥砺，其深者即身心学问之资”，往往会以“伦纪纲常”来彼此劝诫，以规范的言行来彼此学习、相互勉励，深交的这类朋友是一个人身心成长、学问精进的资本。

千百年来，在维系家族延续的诸多要素中，家训是历史演变中家族生存之道的经验总结。同样，随着秦汉以来汉族移民陆续进入琼崖，来自中原家族文化中的家训文化在海南落地生根，这些或书于典册，或口耳相传的家训，成为哺育后代、凝聚族人的文化力量。张岳崧的《家训十则》距今已有二百多年历史，受时代限制存有瑕疵，但去芜存菁、汲取精华，其中所蕴含的廉洁从政为官，奉公守法为民，孝亲和睦为家，恭谨谦让为友等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文化精髓所在。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藏书楼在延续文脉、教化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涵芬楼创立于1904年，以珍藏善本古籍和地方志著称，是商务印书馆上海时期的藏书楼。出版家、教育家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之后，便着手筹建编译所的资料室，1909年，随着藏书量的增加，资料室正式以涵芬楼命名，取“善本书香，知识芬芳”之意。涵芬楼善本古籍和地方志的藏书体系传承了中华文化，对公众开放的管理理念则体现了从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

“求书四法”以充实馆藏

涵芬楼主要采用“求书四法”搜购古籍，即“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域城外”。作为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为涵芬楼的图书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求之坊肆”意为零星购买散落在坊间书估手中的文献要籍，张元济在自家门前设摊“求买旧书”，每到一地出差，总先走访书肆，搜购元明刻本。“丐之藏家”是从藏书家处成批收购，据记载，主要有四次收购，即1904年购得绍兴徐友兰熔经铸史斋善本古籍约50余橱；民国初购得清宗室盛昱“意园”、广东丰顺丁日昌“持静斋”的不少旧藏；1925年购得扬州何氏藏书4万余册；1926年够得乌程蒋氏密韵楼旧藏精品，含蒋氏所藏《永乐大典》残卷10余册。“近走两京”意为从历朝旧都等经济、文化繁荣地域搜购文献。1911年张元济在北京访书，一个月就先后购得了《六朝政事纪年》《蜀鉴》《脾胃论》等元明刻本。“远驰域外”即访书还要放眼国外，如1928年10月张元济赴日本，访问了静嘉堂文库、宫内省图书寮等藏书机构，借照了40余册宋、元、明刊古籍。

据商务印书馆编辑曹冰严所记，从1918年到1936年间，涵芬楼所藏善本古籍和全国地方志，多数是张元济亲手征集的，对一些值得重视的刻本，他都仔细翻阅、精心鉴别，查核存目、批示价格。“求书四法”等造就了涵芬楼丰富而珍贵的馆藏，截至1931年，涵芬楼搜藏善本3.5万余册，一部分珍稀版本，如宋刻本《六臣注文选》、宋黄善夫刊本《史记》等。

珍藏善本以传承文化

涵芬楼的善本古籍内容极为丰富，源于张元济等知识分子拯救我国珍贵古籍文献的历史责任感。张元济在致友人傅增湘的信中曾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

涵芬楼善本古籍涵盖了宋、元、明、清等各个历史时期的版本，包括抄本和稿本等珍本善本。据粗略统计，涵芬楼汇集了宋本129种（2514册）、元本179种（3124册）、明本1419种（15833册）、清代精刻138种（3037册）。其中有许多稀世之珍，如宋本中的《周易》《通鉴纪事本末》《说苑》《陶渊明集》等。还有如《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多种质量上乘的善本。

此外，涵芬楼的藏书还有鲜明的地方志特色，张元济认为：“地方志虽不在善本之列，然其间珍贵之记述，恐有比善本犹重者。”到1931年，涵芬楼藏地方志达2600余种，计25800余册。有元本2种、明本39种、清代及民国时期刊本2524种，有嘉靖年间刊本的孤本方志如江苏省的《崑山县志》、湖北省的《随州志》、四川省的《通江州志》。还有珍贵的抄本和稿本，如张凤孙的《泰宁县志》、李钟峨的《通江县志》等。另有仅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有藏的罗定全的《资县志》等。涵芬楼成为当时收藏地方志最多之处。

整理编目以有序存藏

涵芬楼促进了编目技术的发展，成立初期，因藏书不多，仍然使用四部分类法，但是到了东方图书馆时期，图书增至40万册，兼跨多种类，传统的分类法不能很好适应图书分类的新需求，于1928年出版《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解决图书分类面临的新问题。唐锦泉在《回忆王云五在商务的二十五年》中记载：他（王云五）认为杜威十进分类法在中国图书馆界中比较适用，但应设法扩充，以便容纳中国特有的图书，如中国古代群经诸子及中古、近古哲学著作等。

涵芬楼对图书的管理也做了一些尝试，主要可从目录学著作《宝礼堂宋本书录》和《涵芬楼烬余书录》看出。根据藏书的新情况，《宝礼堂宋本书录》

守护善本书香，传承文化瑰宝

□ 史 云

构筑了“四加一”的体系以区分宋刊本和元刊本，《涵芬楼烬余书录》则在总目录下又形成了三级目录，方便了书籍的检索和查询。涵芬楼在搜集、馆藏古籍的过程中培养了一批精于版本目录和校勘的专门人才如孙毓修等，这对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公诸众览以开启民智

中国历史上的藏书楼大多着眼于藏，随着西学的传播，创办公共藏书楼逐渐成为开民智的题中应有之义。涵芬楼创设之初，张元济在给缪荃孙的信中提到自己“拟劝商务印书馆拨款数万金收购古书，以为将来私立图书馆张本”。可见涵芬楼的目的不仅在于藏，更在于成立公共图书馆，对外开放，使大众受益。

1926年，涵芬楼更名为东方图书馆，“聊示与西方并架，发扬我国固有精神”，原来涵芬楼所藏古籍全部馆藏在三楼，馆内订有《阅览章程》，章程共四章17条，含阅览时间、场所、手续和附则，同时对图书实行分类管理，部分图书提供开架阅览，这在当时的图书馆并不多见。

从1926年至1932年间，东方图书馆的藏书量超过了50万册，各类图片5万多幅，经鉴定或整理的善本近4000种，共3.5万多册，再加上收藏的善本总数近8万册，其中精品和孤本就有逾5000册，东方图书馆堪称当时东方的第一大图书馆。据当时资料统计，1929年入馆阅览者近3万人，1930年达到3.6万人，它的对外开放，使读者受益其丰富的馆藏，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智慧、浸润了文化。

不幸的是，1932年淞沪会战，东方图书馆被日军纵火焚毁，除547部善本书幸存外，其余全部被付之一炬，张元济陆续著录成《涵芬楼烬余书录》，逐一记录版本行款及历来藏家题跋、图记，1951年付印出版。

涵芬楼藏书满足了商务编译出版之需要，实现了保存传统文化之使命，发扬了服务社会之精神，公诸众览、对外开放，与传统藏书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起到了“为天下先”的示范作用。



“极”字蕴涵的哲理智慧

□ 胡晓艺

中国文字博大精深，不仅以“塑形生义，赋义于形”见长，更以“文以载道，启迪智慧”为旨趣。“极”字就是其中一例。《说文解字》中有两处提到“极”。一处写为“极”，许慎释为“驴上负也。从木及声”。这里所说的“极”是指驴身上用来负载东西的木板，后世逐渐将这个含义赋义于“笈”。“极”则不再承载此义。一处写为“榑”，许慎释为“栋也。从木亟声”。这里所说的“榑”是指木质房屋的房顶。后世不仅保留并沿用了“榑”字的原初含义，而且将其简化为“极”字。不仅如此，其词性也从名词扩展为动词、副词。这一方面增加了“极”字在语言表达中的适用范围和使用频率，另一方面也赋予了“极”字丰富的内涵和意蕴。“极”字作为动词是穷尽、遍历的意思。如“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极目楚天舒”等。“极”字作为副词是无以复加的意思。如“高兴极了”“悲伤极了”“乐极生悲”等。

修身治国之道。“极”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中是一个重要标准，与其词源意密不可分。《尚书·洪范》箕子对周武王陈述“建用皇极”的治国大道，后“皇极中道”

被儒家认为是王道政治的理想实践。朱子解为“皇者，君之称；极者，至极之义，标准之名也”。由于中国处于温带季风气候区，木制房屋的构造需要便于雨水下流，因而房屋顶部总是有屋脊高凸，那最高的横梁就是此处的“皇极”。它表达了两层内涵：最高与中央，且最高处在中央，代表着王道上接天意，下爱万民，应取公道、中庸与平衡。“皇极中道”既展现出建筑的自然功用与审美趣味，也是王道价值的体现，由王道引申为人道，就儒家价值理想而言，体现在君子“立人极”的道德实践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追求。

宇宙天人之道。“太极”关联中国人的宇宙观，即时空意识的表述。哲学家宗白华考察了“宇”和“宙”的字源学，认为：“横架于宇（空间）上的宙（时间）就是太极，就是世界的创造性原理。《易》云：时乘六龙以御天。中国古代农人的农舍就是他的世界。他们以屋宇得到空间观念，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即从宇中出入作息，而得到时间观念。空间、时间合成他的宇宙而安顿着他的生活。他的生活是从容的，有节奏的。对于他，空间时间是不能分割的。”宗白华先生的论述为我们理解农耕文明的华夏民族

的时空观、宇宙观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也涉及到对“太极”时空涵义的提示。如果进一步细究为何“极”字能够表达中国人政治理想中智慧与哲学思辨的概念，可以进一步追溯到“极”在较早时期就指涉重要天象。《论语》中孔子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郭璞注“北辰，天之中，以正四时”；《夏小正》载“正月，天柄悬在下”；《史记》言北斗齐“七政”。北辰正是北辰、北斗星。由于北斗永远指向正北，人们想象其为天帝的车乘在天穹中旋转，如同天帝乘车巡游天界，用它来方正四时、框定历法，而圣人明王正如北极星一样，永远有恒，以为垂范。农时历法对农业民族而言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能够指导农时的天象是古代帝王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正因“极”作为天时星象的词源使用，使得它具有超越一般词汇的意义之境。因而在先秦文本中就被使用，并逐渐以“皇极”“太极”“无极”等核心概念影响中国人的生活实践与思想世界。

哲学致思之道。从“极”字中感悟中国哲学致思之道。如前所述，“极”字原本指称房屋最高处的木头，后来又引申为更抽象的含义，并逐渐发展为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哲学史家朱伯崑分析

过《易经·系辞》“易有太极”章中“太极”一词的内涵，通过比较先秦与后代易学文献，朱伯崑认为，“太极”作为一个范畴，在易学史和哲学史上，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其最初的涵义指空间的最高极限，如《庄子·大宗师》中所谓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取的正是“极”作为房屋最高处之栋的本义引申；在先秦的文献中，“太极”还不是描述本体或实体的范畴，在《易经·系辞》中“易有太极”章与“大衍之数”章逻辑相同，指六十四卦的根源，是讲筮法，在汉代气论思想的影响下，逐渐演变为实体的概念，成为说明世界本体的范畴。“太极”在魏晋哲学中，已经向本体论范畴演进，王弼以大衍之数五十不用之“一”为太极是该思想演进的说明。到宋代有周敦颐“无极而太极”释义的分歧，可以说“太极”概念理解的演变正体现出中华民族哲学思维的发展进步。

